明代研究 第三十四期 2020年6月, 頁95-144

DOI: 10.3966/160759942020060034002

從一目十行、日誦萬言看中國近世士人的 博覽強記之風

張藝曦*

在日常生活中,常以「一目十行」形容一個人讀書快速且記憶力好,古籍則另有「日誦萬言」一詞,而具備此類能力的人,往往被視為天才或有特異功能。但即使是天才,往往須在社會重視其才能時,天賦才會凸顯,所以當相關記載越來越多,而且有人專門討論時,便形成值得探討的一種文化現象。從士人共同追求的目標來思考一目十行日誦萬言,便有其歷史的趣味及意義。

隋唐以前的相關記載,多將一目十行、日誦萬言視為是少數士人的特殊才能,但兩宋以後隨著署名歐陽修所作讀書法的流行而有改變。這個讀書法提出一個中人可行的方式,不追求超凡的記憶力,而是落實到日常生活中,藉由每日的積累,達到跟記憶力超凡者同樣的結果。於是原本只是少數人炫耀的才能,如今即使一般士人也必須承受記誦數十萬言儒經的期待與壓力。於是有理學家——尤其是心學家指出另一條路、另一個選擇,但從金溪的這個個案來看,效果似乎很有限。

關鍵詞:一目十行、過目成誦、讀書法、心學、金溪

^{*}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Email:ic2110@gmail.com。

前言

在日常生活中,常以「一目十行」形容一個人讀書快速且記憶力佳,古籍則另有「日誦萬言」一詞,而具備此類能力的人,往往被視為天才或有特異功能。但即使是天才,往往須在社會重視其才能時,天賦才會凸顯;相反的,若是所處群體並不重視,例如在士人圈中,具備演戲才華的人,天賦很容易被埋沒。所以當相關記載越來越多,而且有人專門討論時,便形成值得探討的一種文化現象。從士人共同追求的目標來思考一目十行、日誦萬言,便有其歷史的趣味及意義。

一目十行或日誦萬言跟士人的讀書法有關,而以歐陽修(1007-1072)與朱熹(1130-1200)的讀書法最為著名,而且影響當代及後世甚大,目前相關研究多將之放在學術史或思想史的脈絡下討論,所談較多偏重在對一家的學術思想的研究或討論。¹也有學者綜觀宋、元兩代理學家的讀書法,以及反思這類讀書法的學習規劃,與近世士人的知識世界的關係。²程端禮(1271-1345)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以下簡稱《讀書分年日程》)則是在歐陽修、朱熹的讀書法以外,也很重要的日程規劃書。

本文則從人們如何看待及討論記憶力,而涉及讀書法與讀書日程規劃。 隋唐以前的相關記載,多將一目十行、日誦萬言視為是少數士人的特殊才能,但兩宋以後隨著署名歐陽修所作的讀書法的流行而有變,這個讀書法提出一個中人可行的方式,不追求超凡的記憶力,而是落實到日常生活中,藉由每日的積累,達到跟記憶力超凡者同樣的結果。記憶力超凡者可以在短期內記下十三經,而此讀書法則讓中人之資者日積月累以數年的時間達到相同的成果。由於歐陽修讀書法的流行,原本只是少數人炫耀的才能,如今即使

¹ 如林素芬,〈論歐陽修的讀書法及其作史之實踐〉,《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7(2008),頁124-157;林啟屏,〈朱子讀書法與經典詮釋:一個信念分析的進路〉,《中正漢學研究》,23(2014),頁1-23;王雪卿,〈讀書如何成為一種工夫:朱子讀書法的工夫論研究〉,《清華中文學報》,13(2015),頁49-106。

² 胡琦,〈宋元理學家讀書法與「唐宋八大家」的經典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52 (2018),頁1-43。

一般士人也必須承受記誦數十萬言儒經的期待與壓力。尤其隨著明中期以後 印刷術的流行,許多過去不易得不易見的儒經與古籍都變得相對易得易見, 過去士人即使有意遍讀十三經,也未必有十三經可讀,如今則不必再受限於 現實條件,加上科舉制度下,八股文寫作亦要求記誦儒經及博覽子史,都對 士人產生莫大的心理壓力。於是理學家——尤其是心學家指出另一條路、另 一個選擇,所以先後有朱熹的讀書法、程端禮的《讀書分年日程》,以及王 守仁(1472-1528)的〈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以下簡稱〈訓蒙大意〉),但 從金溪的這個個案來看,效果似很有限。

一、一目十行俱下

「一目十行」(或「十行俱下」)一詞較早的知名典故來自《北齊書·文襄六王傳·河南康舒王孝瑜傳》:「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³覆棋不失一道,所指的是下完棋後仍然可以根據落子先後次序,從第一手覆到最後一手,由於行棋有邏輯可循,所以覆棋不失一道雖然不易,但仍非難以企及之事。但此後這類用詞便多專指士人讀書速度甚快,直到明清仍多採這個用法,如明代姚鏌(1465-1538)的故事,據載:

先生一目十行,通夕可了數百卷,無論甲乙,唱名時悉能覆誦其文, 士無不驚以為神。⁴

因為一目十行,所以姚鏌一晚便可看完數百篇文,速度算是快的,至於對所讀文章可達到什麼程度的覆誦,此處未能得其詳,所以不易深論,但應只是為了強調姚鏌有好好讀完,而非草率翻過而已。我們若翻檢古籍或地方志,便可找到許多「一目十行」的例子,儘管大多數後面都沒有加上能夠覆誦其文一類的句子,但意思仍是一樣,亦即雖然讀書很快,但卻不是草率讀過而已。

⁴ [清]馮可鏞修,[清]楊泰亨纂,[光緒]《慈谿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1975),卷27,〈列傳四·明二〉,頁566。

^{3 〔}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 11,〈列傳第三·文襄 六王〉,頁 144。

除了十行以外,常見的還有五行、七行、八行俱下,行數的不同,除了 只是個別記載的差異以外,似乎也有一些外在客觀的因素可以探究。其中, 隋唐以後雕版印刷術的流行及使用,應是造成較大影響的關鍵因素,所以此 處便以隋唐以前,及兩宋以後為前後兩段時期分別討論。

隋唐以前,除了北齊河南王高孝瑜(537-563)的十行俱下以外,還有五行俱下與七行俱下。五行俱下以應奉的例子最著——孔融(153-208)《孔北海集》載:「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⁵另有七行俱下,典故源出南北朝的宋世祖(430-464,453-464 在位):「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⁶宋世祖之弟宋明帝(439-472,466-472 在位),據《文苑英華》載:「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⁷書奏即書簡、奏章。應奉是東漢人,高孝瑜及宋世祖、宋明帝都是南北朝人。

雕版印刷術流行以前,許多文獻會寫在簡帛或紙本上。應奉的時代較早,當時所讀文獻應是寫在簡帛或竹簡、木簡上,而高孝瑜及宋世祖、宋明帝所讀則是紙本的經卷。一個人是否五行、七行或十行俱下,應該有可供人外在判斷的標準,此標準應即竹簡或卷軸捲動的行為。讀的人先攤開五行、七行或十行的寬幅,而一旦捲動竹簡或卷軸,旁人便知他已讀竟。據此可知,應奉所攤開的竹簡應有五行左右,而高孝瑜等人每次開的卷軸則有七行或十行的寬幅。

兩宋以後,同樣的詞彙仍被廣泛使用,直到明清亦然,如清人汪琬

^{5 〔}漢〕孔融,《孔北海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汝潁優劣論〉, 頁 242。

^{6 [}唐]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2,〈宋本紀中第二〉, 頁 55。

[[]南梁]裴子野,〈雕蟲論并序〉,收入[宋]李昉等奉敕編,《文苑英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742,〈文〉,頁 233。七行俱下的例子,除了帝王以外,有些僧人也是如此,如五代延壽智覺禪師(904-976)「持《法華經》,七行俱下,才六旬,悉能誦之」。[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上海:上海書店,1985),卷 26,〈行思禪師第十世·前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頁 9b。如唐代善伏師(?-660),「生即白首,誦經典,一目七行」。見[宋]史能之纂修,[咸淳]《重修毗陵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25,〈德釋〉,頁 229-230。

(1624-1690) 與凌廷堪(1757-1809):

汪琬,字苕文,少孤自奮,讀書五行俱下。8

先生姓凌氏,諱廷堪, ……生有異稟,觀書十行俱下。,

儘管詞彙相同,但所實指的狀況有別。雕版印刷的流行,使得士人所讀除了 抄本以外,也有刊刻的本子。這類刊刻本一頁的行數從七到十行皆有,也有 一些是十二或十四行。無論七、八、十行俱下,應指讀竟一頁,五行俱下則 指讀竟半頁。五、十行俱下的差別,跟閱讀者持書的方式有關,若是把書的 左右兩頁反折,一次讀一頁,則是十行俱下。若是把書捲成小圓筒狀,一次 只讀半頁,讀竟右半頁,手腕稍轉一下,便可繼續讀左半頁,旁人據其手腕 的轉動而知其讀竟,此即五行俱下。

不過,七行或八行俱下雖跟十行俱下都指讀竟一頁,但彼此間仍有細微的差別。「十行俱下」本就是一種帶有矜炫意思的形容詞,而當人們已習用此類詞彙,卻捨十行而標舉七或八行俱下,便頗耐人尋味。刻本行數的多寡跟成本有關,若每行的字數差異不大的話,行數越少,成本越高,而行數越多,則成本越低。七或八行的刻本成本應較十行高,因此儘管在一般的用法上,七或八行與十行俱下之間並無明顯區別,但在某些個案卻可能是為凸顯此人的家世或身份而選擇七或八行俱下的用法。如北宋真宗(968-1022,997-1022 在位)被形容為「天縱將聖,典學時敏,百斤中程,七行俱下,詳延英俊」。「供清高宗(1711-1799,1735-1769 在位,1795-1799 太上皇)翻檢的《欽定文淵閣四庫全書》,在排版上也是一頁八行。明初劉基(1311-1375)雖非帝王之尊,卻是世家子弟,他所讀的書也是一頁七行,據載:

曾祖濠為翰林掌書,每陰雨積雪,登高邱,望其聚突無煙者賑之;……祖廷槐、父爚,有智計,通經術,為遂昌教諭。基少穎

^{&#}x27;〔清〕李銘皖、〔清〕譚鈞培修,〔清〕馮桂芬纂,〔同治〕《蘇州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卷 88,〈人物十五〉,頁 309。

^{9 〔}清〕張其錦編,《凌次仲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凌次仲先生事略狀〉,頁111。

^{10 [}宋] 葉清臣,〈御書閣牌〉,收入[明]董斯張等輯,《吳興藝文補》(臺南: 莊嚴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卷13,〈宋文〉,頁265。

脱,讀書七行俱下。11

《揚州畫舫錄》所載的吳秘,家世富至百萬,同樣標榜其一目七行——

吳景和,以一文起家,富至百萬;子秘,字衡山,聰明過人,一目七 行,世以孝稱。¹²

蘇州吳尚儉(1528-1601)家世貴顯,讀書則是一目八行俱下——

吳先生尚儉,字恭先,尚書文端公孫,參知子孝公子也,家世貴 顯。……嗜讀書,一目八行俱下。¹³

除此以外,一目二十行的說法也不少見。古籍一面約 10-14 行,若將書攤開,左右兩面並看,最多可達 28 行。若有雙行夾註則行數更多。所以一目二十行,指其一次讀竟雙面,可推知此人應該是把書攤開在書桌上,而非拿在手上讀。

儘管各個時代都有一目二十行的例子,但就目前所見,似以清代士人更 強調行數,更喜誇大其數目,如:

張晉徵(1601-1665),「爰從伯氏仲銘公,手授四傳,目數十行下, 無少遺忘」。¹⁴

汪中(1745-794),「少聰敏,讀書數十行下,而確然隤然,不形于詞色。少長,遂通《五經正義》及群經註疏,貫串勃窣,其積穰穰,有叩者則應對不窮。」¹⁵

_

^{11 [}清]傅維鱗,《明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卷 143,〈劉基傳〉,頁 2844。在張時徹 (1500-1577) 《芝園集》中也有記錄其一目七行的能力,而且更為詳細:「公諱基,字伯溫,神知逈絕,讀書能七行俱下。年十四入郡膠,師受《春秋》,未嘗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辨決疑義,出人意表。為文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目即洞其旨。」見〔明〕張時徹,《芝園定集》(臺南:莊嚴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卷41,〈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頁 273。

^{12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13,〈橋西錄〉,頁719。

^{13 [}明]文震孟,《姑蘇名賢小紀》(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下,〈封大夫 吳德園先生〉,頁60。

[「]清〕金之俊,《金文通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13,〈前中憲大夫福建觀察使菊存張公墓誌銘〉,頁467-468。

^{15 「}清〕王昶,《春融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59,〈汪容甫墓

汪廷璋,「初就外傅,讀書日(按:應作目)下數十行,塾師奇之」。¹⁶ 祝德星,「性穎悟,讀書數十行下,而發憤攻苦,至廢寢饋,年纔逾冠,致瘵疾卒」。¹⁷

以上幾例,除了張晉徵身處明末以外,其餘皆清人,此現象可能跟清代博學及考據的學風有關。明、清學術有別,明人講究的博學是博而雜,清人是博而精,反映在讀書方式上,清人講究考據,所以可能更常把書攤開在桌上默讀,而非拿在手上朗朗誦讀,加上考據文字常有雙行夾註的情形,所以兩頁常達數十行之多。可能是這個緣故,所以清代文獻較常見一目數十行的記載,以強調其讀書速度之快之多。

二、過目成誦或日誦千言萬言

除了一目十行,另有關於「過目成誦」的記載。《廣韻》對「誦」的解釋是「讀誦也」,古人讀書常會朗讀出聲,所以應是朗誦、誦讀之意,而「過目成誦」則常指其能夠記憶內容。¹⁸如東漢荀悅(148-209)的例子:

(荀)悦,字仲豫,……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閒,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¹⁹

一覽多能誦記,應指他對許多段落內容都已記憶無誤。此處未指明所見篇牘長短,由於簡牘多以篇計,若僅只一篇,字數不至於太多。另如北齊元文遙的例子,據說在《何遜集》初傳入洛陽時,文遙一覽便誦——

-

碣〉,頁576。

^{16 [}清]錢陳群,《香樹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21,〈奉宸苑卿汪君廷璋傳〉,頁227。

^{17 [}清]阮元輯,《兩浙輶軒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38,〈祝德星〉小傳,頁431。

¹⁸如金溪的櫟林周氏的周禮,族譜記載他「讀書以記誦為主,聲朗朗不休」,便是誦讀出聲以助記憶。見〔清〕周穆菴修,《戊元櫟林周氏族譜》(金溪合市鎮龔家戊元村周新友家藏,道光二十四年[1843]重修本),卷 1,〈世系橫圖·濟八十公〉,頁80。

^{19 [}劉宋]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62,〈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頁2058。

文遙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 賓客,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河間邢邵試命文 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²⁰

何遜(?-518),字仲言,東海人,南北朝的梁朝詩人,卒後,同鄉王僧孺(465-522)集其著作為8卷本,但大部分已亡佚,明代《永樂大典》所收的殘本僅2卷,而且只有詩作。儘管不確定當時文遙所誦《何遜集》卷數,但宴會中賓客未必帶足8卷本的集子,加上《何遜集》中有不少詩作,所須誦讀的字數不會太多。另如唐代蘇頲(670-727)之例,據載他「一覽至千言,輒覆誦」,²¹可知他單次記憶的字數大約在千言左右。

另有一些特殊個案,所讀是卷帙頗大的史書,而且能夠記誦下來。如南 北朝梁朝的陸倕(470-526)晝夜讀書,能夠記誦共 100卷、達八十多萬字的 《漢書》,且以默書《漢書·五行志》證明這項能力——

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也。……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間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恭,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²²

由於不清楚陸倕每讀一遍所花時間,所以難以估算其記憶效率,倘若他是一日讀半卷或一卷,則可能花費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每日所須記憶的應有數千字左右。至於邢邵(496-?)的例子則更令人驚異,據載:

(邢) 卲,字子才,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强記,日誦萬餘言。……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為娱,不暇勤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既瞻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²³

-

²⁰ [唐] 李百藥, 《北齊書》, 卷 38, 〈列傳第三十·元文遙〉, 頁 503。

²¹ [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25,〈列傳第五十· 蘇瓌〉,頁 4399。

²² [唐] 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27,〈列傳第二十一・陸 (本),頁401。

²³ [唐] 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43,〈列傳第三十一·邢
巒〉,頁1588。

邢邵日常能力是五行俱下,日誦萬餘言,已甚驚人,而五天讀竟《漢書》,若說他能記誦,等於平均一天須記誦 16 萬字,可謂驚世駭俗,幾非人力所能,所以關鍵可能在「略能徧之」,亦即邢邵只是熟讀《漢書》,未必有全部背下來。²⁴類似的誇飾形容亦見於明末復社成員夏允彝(?-1645)談其父親讀《資治通鑑》——

嘗讀涑水氏《通鑒》,一月盡之,终身不忘。²⁵

《資治通鑑》全書共三百萬字,一月盡之,等於一天須記誦 10 萬字,這根本不可能,因此所謂的不忘,也比較像是對《資治通鑑》內容的熟悉。

對於古人談論記誦的記載,我們有必要同時考慮兩方面:首先,古人說的記誦,未必都是指一字不漏的記憶無誤。其次,所謂的記憶,其實牽涉兩方,一方是記憶者,一方是旁觀者。旁觀者不會坐在旁邊,等某人把三百萬字的《通鑑》背給他聽,也不會拿著一本《通鑑》,像老師考學生一樣,讓人把《通鑑》從第一頁背到最後一頁。所以我們可以推測一種可能的情境是:夏允彝讀《通鑑》時,其父把書中某卷的故事說了一遍,由於所講故事的情節、人物問答的內容都極詳盡,於是便讓夏允彝歎服其父能夠記誦《通鑑》。

除了過目成誦,也有一種用法是為記誦能力加上時間單位——通常是以一日為單位,而有一日千言與萬言之別。能夠一日千言或數千言的人,已是 資質極其聰穎。如沈一貫(?-1615)為江應曉作墓誌銘,稱其「幼而穎拔,日 誦千餘言,塾師屢遜席」,²⁶李流芳(1575-1629)的仲兄李名芳(1565-1593),

²⁴ 北宋張安道(1007-1091)的例子與邢邵相似,蘇軾(1037-1101)在其墓誌銘寫道:「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家貧無書一事,正好說明北宋的書籍流通仍較有限,所以記誦有其必要性。三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張安道在十日之內便可得三史之詳,驚世駭俗的程度不下於邢邵五日讀《漢書》。所謂得其詳,較可能的解釋,應是指精讀熟悉的意思。引文見〔宋〕蘇軾,《東坡後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卷17,〈張文定公墓誌銘〉,頁1。
25 [明]陳子龍,《安雅堂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3,〈夏方餘

[[]明]陳子龍,《安雅堂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3,〈夏方餘 先生傳〉,頁121。

 $^{^{26}}$ [明]沈一貫,《喙鳴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15,〈明故江涪陵公墓誌銘〉,頁 263。

幼時也是「日讀數千言,或自默識,叩輒成誦」。²⁷至於更上一層的日誦萬言,則已不只是聰穎而已,而根本不是常人所能。萬言是千言的十倍字數,所以能夠日誦萬言的人,等於能夠以十倍於聰穎之士的讀書份量記誦及吸收各門各類的知識。前引邢邵日誦萬餘言,若是循序漸進,則 80 萬字的《漢書》,只須 80 天便可記誦完畢。另如宋代丁宋傑(1197-1266),據稱他「誦《前漢書》,日萬字」,²⁸同樣也是「日誦萬言」。元代吳萊的記憶力也很驚人,據載——

(吳)萊,字立夫,……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迫扣之,萊琅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驚以為神。²⁹

此處說「一經目輒成誦」是指對《漢書》的記憶。《漢書》一卷的字數平均 約 8000 字,一帙應有一到數卷不等,所以吳萊(1297-1340)每日所讀應有達 到萬言以上。

由於重視記憶力,所以還衍生出很多傳說故事,如清初李來泰(1631-1684)回憶臨川當地流傳以久的故事,這則故事的主角是宋人蔡元導,據說他把書販擔中的書取來讀,「一覽成誦」,該名書販氣憤不已,於是「焚書而去」,而該地點便被取名為焚書丘。³⁰類似情節甚至也可見於今日的武俠小說,³¹可知這類故事多麼為人所津津樂道。另外也很流行記憶力比賽以互較高下,這類比賽講究只看過一或幾次,然後較量各自記得多少。如南北朝蕭穎士(707-758)等三人「誦路傍碑」便是很典型的例子——

蕭穎士嘗與李華、陸據游洛龍門,讀誦路傍碑,穎士即誦,華再閱,

_

²⁷ [明]顧天埈,《顧太史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5,〈翰林院庶吉士李君墓誌銘〉,頁 87。

^{28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卷 164,〈丁宋傑〉,頁4b。

²⁹ [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181,〈列傳第六十八·黃 晉〉,頁4189。

³⁰ [清] 李來泰,《蓮龕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11,〈山川〉, 頁167。

³¹如金庸《大漠英雄傳》中黃藥師之妻只把《九陰真經》翻讀過一遍,便可記誦無礙。

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³²

這類競賽在不同時代都有,而且常成為人口傳誦的故事。如沈鯉(1531-1615)也談到同年進士韓楫(1527-1605),「與同里張文毅公並有才名,嘗共讀道旁碑,一過目輒互相覆誦無遺,人傳異之。」³³看來路旁的碑刻是很好的記憶比賽的道具。

另一則很著名的故事,即明代歸有光 (1506-1571) 與友人季龍伯相約記 誦壽序事,在江南一帶廣為人所知。季龍伯向來以記憶聞名,據載他讀書不 超過二遍——

有言公(按:季龍伯)一目成誦者,公曰:無之,吾于書讀不過二遍, 庶幾不忘耳。³⁴

由於季龍伯的記憶力甚強,所以某日他與歸有光共遊王鏊 (1450-1524) 故 宅,便比賽記憶壽序,據載——

都南濠(按:都穆) 嘗為王文恪公(按:王鏊) 作壽序,幾萬言,為郡人所傳誦。先生(按:季龍伯) 偕太僕(按:歸有光)、經元(按:即經魁方元儒)往觀之,讀二遍,而私至寓所各書焉。太僕忘數十處,盡補之;經元忘二十餘字;先生忘二字耳。蓋其穎異如此。³⁵

季龍伯讀書不過二遍,而此次讀二遍,所以全篇壽序內容只忘了兩字,就記憶力的比賽來看,季龍伯大勝。但此事還有後續——

太僕多訛脫,輒以意竄入,其文愈善。公自訟曰:吾政自苦其二遍, 不如熙甫忘。學者傳說公言至今。³⁶

歸有光的記憶力雖不如季龍伯,但輔以己意所寫下的壽序,反而較原作更

-

^{32 [}宋]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3,〈オ 徳・誦路傍碑〉,頁287。

^{33 [}明]沈鯉撰, [清]劉榛輯,《亦玉堂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卷10,〈明中議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元澤韓公墓誌銘〉,頁342。

^{34 [}明]張大復,《崑山人物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8,〈季龍伯〉,頁663。

^{35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1,〈先外祖季五山先生暨支狄二孺人墓誌〉,頁512。

^{36 「}明〕張大復,《崑山人物傳》,卷8,〈季龍伯〉,頁 663。

佳,此例或也凸顯記憶力的侷限所在,即使記憶力強,也不見得能夠得到更 多的讚譽。

以上所述對記憶力的矜炫,多限制在某個碑刻或某篇文章,而沒有廣及於平日所讀的全部書。如前引吳萊的「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只限於他對《漢書》的精讀與記憶。季龍伯的記憶力雖佳,但他必須讀兩遍方才不忘,因此他可以選擇哪些典籍認真讀兩遍,以記憶下內容,而哪些典籍則是只讀一遍而不必記誦。而且在季龍伯與歸有光的這場比賽中,我們可以想像,當時幾人應是屏氣凝神,把那篇壽序好好讀完一遍以後又再重複一遍,以求記憶無誤,而不是如表面上給人的印象,只是迅速看過一遍而已。

三、兩詞結合——作為日常記憶力的指標

「一目十行」與「過目成誦」除了各有所指以外,兩詞也常被連用,前 者講究速度,後者要求記憶。人腦不是相機,難以快速一閃而過便即記住全 部內容,所以兩詞連用更凸顯其非凡能力。

「一目十行」與「過目」,字面上意義差不多,但細究則不同。「一目十行」指一次讀十行的文字,應會很快讀完,所以時間不會花費太久,畢竟是「一目」,所以若拖太久便很奇怪。「過目」跟前面所常用的「一覽」、「一過」很相近,指讀過一遍,但花多少時間則不確定。舉例來說,同樣讀一頁十行的文章,一目十行者只須一目便即過去,而過目成誦者卻可能分作數次方才結束,所以若是一覽或一過而成誦者,讀一頁的時間,可以是一分鐘也可以是十分鐘。一如唐代常敬忠的例子,據載他「一過誦千言」、七過誦萬言,此處的一過,便是指讀過一遍之意,而所花的時間應不會是短短幾分鐘的時間而已。³⁷

也因此,若是一目十行與過目成誦連用,則偏重強調可以在很快的速度

^{37 [}宋]佚名,《新編翰苑新書前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 68, 〈頌德下·記聞〉,頁557:「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問曰: 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萬字試之,七過已通熟。」

內讀過並記住。只是對一目的時間多久並沒有標準,最誇張的說法,即如李治(1192-1279)所主張的「一息讀竟」,³⁸這種速度的精讀應該不太可能。比較常見的例子,是在限定條件下迅速讀過,且能成誦,而不是漫然說成每天每日讀書皆如此,如殷雲霄(1480-1516),據載他是「讀書數行下,既成誦,終身不忘」,³⁹看來殷雲霄的記憶力是非常強的,但須注意他的前提是「既成誦」,但須多少時間才能既成誦則不確定,而且他未必會記下所讀的每本書,而只選擇特定的一些書才成誦。又如王慎中(1509-1559)談其友人洪朝選(1516-1582)的記誦能力,也是一目十餘行下便可成誦,他說:

書一目十餘行下,一經手,未嘗再觀。書至千百餘卷,君蓋無所不 觀,而亦未嘗再觀。余嘗翻其架上書,書無一卷完者。讀竟,即為人 竊去,君亦不復顧也。⁴⁰

經手應即過目的意思,未嘗再觀,則是凸顯他只讀過一次便即記住。王慎中 為了阻止讀者多疑,還特別用「書無一卷完者」,以證明洪朝選真的把架上 的千百餘卷書都看過一遍,而且都記了下來。

另有一些個案會區別一目之下所讀的行數多寡不同,而記憶程度也隨之 有別。如晚明曠禪師(1556-1601),他能詩作文,與後七子相關人物如王穉登(1535-1612)、屠隆(1542-1605)等人往來,他讀書從四行到十行到二十行,經歷一段曲折的變化——

年甫十一時,讀書不過四行,即窮日之力不能記憶,每自悔恨流涕。 忽發願禮清淨三業,亡何,忽成誦十行,乃至二十行俱下,見者怪而 詰之,師亦不知其故。⁴¹

^{38 〔}元〕李治,《敬齋古今黈》(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卷 4,頁 331:「應奉讀書五行俱下,宋孝武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蓋言其敏也,五行、七行俱下,猶云一息讀竟耳。」

^{39 [}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17, 〈殷雪雪〉,百 356。

 $^{^{40}}$ [明]何喬遠編撰,《閩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卷 152,〈蓄德志〉,頁 4502。

⁴¹ [明] 黃汝亨,《寓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4,〈語溪曠禪師塔銘〉,頁201。

而且一目十行與二十行的差別也會被拿來比較,如地方志上載鮑之鍾 (1740-1802) ——

讀書目十行,中年後猶一過覽;二十行,記一月不遺隻字。⁴² 若一目十行,所讀字數較少,可記得多年不忘;若一目二十行,同樣時間內 所讀字數較多,記憶力只可維持一個月。

還有一種方式是把「一目十行」(或數行)與「日誦千言」(或數千言)連用,這在明清兩代的許多文獻,尤其是地方志上頗為常見。⁴³由於確定指出所讀的字數,所以讓「一目十行」的「一目」變得更具體,而讓我們可以估算閱讀與記憶的效率。

如 5000 字應有 250 行,考慮到常因抬頭分段而數字便算一行的狀況,則

42 [清]何紹章、[清]馮壽鏡修,[清]呂耀斗等纂,[光緒]《丹徒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卷33,頁657。

43元代韓性(1266-1341),「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見〔明〕楊維新,〔萬曆〕《會稽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卷 11,〈人物傳·列賢〉,頁 455。

元代朱嗣壽(1287-1355),「幼聰悟,讀書數行並下,日記近萬言」。見徐一變, 〈鞠隱先生墓碣〉,收入〔清〕王壽頤、〔清〕潘紀恩修,〔清〕王棻、〔清〕李 仲昭纂,〔光緒〕《僊居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清光緒二十年[1894] 木活字印本),卷4,〈文外編六·碑銘〉頁5a。

明代張禔,「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見〔光緒〕《僊居志》(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卷15,〈人物·列傳〉,頁703。

明代李遇知(1583-1644),「自童子時,光采四照,日授萬言不忘,且數行俱下」。見劉如漢,〈少保天卿李公紀略〉,收入[清]嚴如熤原本,[清]楊名颺續纂,[民國]《漢南續修郡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 27,〈藝文下〉,頁426。

明代吳崇節,「讀書數行俱下,日誦二萬言」。見〔清〕蔣繼洙等修,〔清〕李樹藩等纂,〔同治〕《廣信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 9 之 3,〈人物・儒林〉,頁 815。

宋代朱吉甫(1205-1265),「觀書數行並下,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見文及 翁,〈朱吉甫墓碑紀略〉,收入〔清〕汪榮修,〔同治〕《安吉縣志》(上海:上 海書店出版社,1993),卷15,頁427。

明代章模,「日記數千言,目五行俱下」。〔明〕田琯纂修,〔萬曆〕《新昌縣 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4),卷11,〈鄉賢志·遺英〉,頁65a。

清代趙元福,「少穎悟,一目數行,日誦數千言」。見〔民國〕孫毓琇修,〔民國〕賈恩紱纂,〔民國〕《鹽山新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卷18,〈人物篇十之中·文學列傳〉,頁755。

可能有 300 行以上。若是一目十行俱下,則 5000 字 300 行,須看 30 目,即 30 次十行俱下。假設 4 小時的時間,以 30 次算,則每次 8 分鐘。亦即每次 十行俱下,把十行的文字(200字以內)讀過記下,約須花 8 分鐘。

8 分鐘一目十行俱下是否太久?這個問題不易回答。若是所記誦的字數 低於 5000 字,如 2500 字,所花時間是 4 小時,則十行俱下的速度便會拖慢 成 16 分鐘。相對的,若是少數可以達到記誦萬言的人,同樣花 4 小時讀,則 每次十行俱下的時間是 4 分鐘。

無論是一目數行或十行,日誦千言或萬言,這類在古籍或地方志中常見的記載,都屬於特殊卓越的能力,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而且也不太可能真實指涉日常生活中每天的讀書速度。畢竟若是日誦萬言,則一年下來便可記憶 365 萬言,即使是日誦千言,則三年下來也達百萬言,若說可以全數記誦無誤,委實不可思議。

參考清人徐嘉炎(1632-1704)的例子,應有助於我們對這類誇大用詞的理解,據載:

徐嘉炎,字勝力,……一目十行下,誦三遍,終身不忘。……康熙王子副榜,戊午舉博學鴻詞,……歷侍讀學士,……直南書房,召嘉炎至榻前,問:「爾五經、《通鑒》皆能成誦否?」嘉炎奏:「五經或可背誦,《通鑒》恐未能悉舉其詞。」隨問《尚書》「咸有一德」,嘉炎奏明書旨,朗誦終篇,後更端問宋元祐三黨諸人是非,嘉炎數對諸人姓名、始末及先儒論斷優劣語。44

儘管說徐嘉炎誦三遍終身不忘,但實際上是可背誦五經,而無法背誦史籍。 經書與史籍的區別,下文談到歐陽修的讀書法將再詳及。

清人陳其元 (1811-1881) 的話也可參考。陳其元稱許金谿戴敦元 (1768-1834) 是他生平最佩服的博雅宏通之士,他說:

余特搜僻典數則叩之,公則曰:年老記憶不真,似在某書某卷第幾頁 第幾行內,其前則某語,其後則某語。試繙之,則百不爽一。蓋公固

-

^{44 [}清]許瑤光等修, [清]吳仰賢等纂, [光緒]《嘉興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券52, 〈列傳・秀水〉,頁1423。

十行俱下,過目不忘者也。余嘗問公:天下書應俱讀盡矣?公曰:古 今書籍浩如淵海,人生歲月幾何,安能讀得遍?惟天下總此義理,古 人今人說來說去,不過是此等話頭,當世以為獨得之奇者,大率俱前 世人之唾餘耳。⁴⁵

陳其元所叩詢之僻典有可能是出自戴敦元較熟悉的幾本書,所以戴敦元能夠 記誦卷頁行數,而陳其元便誇稱其過目不忘。這跟陳寅恪的助手所述頗類 似,據說陳寅恪在眼盲以後,無法親自翻書,便指點助手查某本史書的第幾 卷第幾頁第幾行。

這類矜誇或誇飾記憶力的用詞,往往會限定記誦的範圍或書籍:或者是限定指記誦特定的某部典籍,或者限定在某次的考驗。這種在限定條件下誇飾其記憶力超凡的的敘述方式,始終是人們在談論記憶力時的主線。但在這條主線以外,還發展出另一條線,這條線所注意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上的記憶力,署名歐陽修的讀書法便是在此脈絡下提出的,這個讀書法不追求超凡的記憶力,而是針對一般人,藉由每日的積累,可以達到跟記憶力超凡者同樣的結果。記憶力超凡者可以在短期內記下十三經,而此讀書法則讓中人之資者以一日三百字的進度,日積月累,以數年的時間記誦十三經共數十萬字的內容。但另一方面,因為歐陽修的讀書法的流行,原本只是少數人炫耀的才能,如今讓一般士人也必須承受記誦數十萬言儒經的期待與壓力。

四、歐陽修讀書法的典範

一目十行過目即誦可說是許多士人追求的目標,但這個目標會因時代不同而有別,而且跟兩個條件有關,一是書籍的數量,一是記誦的用處——尤其是準備科舉考試。這兩點都可以在隋唐與兩宋之間劃出分界。

首先, 隋唐以前的書籍流通數量有限, 許多後世人手一本的書籍, 當時 未必能夠輕易獲得, 只有少數人才可能讀到全部儒經。但兩宋以後雕版印刷 術的流行, 士人較諸前代更可能接觸到各類書籍, 尤其是明中期以後, 書籍

^{45 [}清]陳其元,《庸閒齋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2,頁30。

流通更盛,書籍市場亦更蓬勃,加上書籍的價格大幅下降,許多人都可買得起書,於是士人不僅有了通讀十三經的條件,甚至也可輕易涉獵史、子、集類的書。⁴⁶有人據此而對比古今之博學之別,舉西晉以博學著稱的張華(232-300)為例,指出:

文之傳於今者多矣乎,古人之爲博易與耳。張茂先(按:張華)擅號百代,綜其書,以車計者僅三十,自卷積之而盈車,自一積之而三十,竊意一車之載,終歲可了,數年而程,世而畢焉。人生十齡而知書,年四十則駸駸乎方駕茂先矣。自茲以來,若水之達,佔畢矻矻,有莫舉名。田家之牛,三千汗之不足;竇氏之棟,五百充而有餘,洋洋多矣乎。人卽一目數十行下,日閉門手一編,倏忽百年,將毋徧觀而盡識否也。⁴⁷

據載張華曾讀三十車書,若一年讀一車,三十年便可通讀完畢,如此便可號 稱博學。但今日書籍太多,以致今人即使日日勤學,一目數十行下,終其一 生也難以達到足以號稱博學的程度。

其次,宋以後的士人須藉由讀書考試以取得功名,記誦是須具備的基本 能力,尤其明清兩代的科舉考試是以制藝寫作為主,而制藝是儒經的經義之 學,理想上士人必須熟習全部儒經,所以對記誦的要求更加明確。也因此,

46宋代印刷術已發達,而書籍流通亦較前代為多,如蘇軾對比從宋初到他所處時代的變化,指出:「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見〔宋〕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收入〔明〕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40,頁 670。在他的上一代,即連《史記》、《漢書》也不易見,而經過一代以後,不僅史籍,即連諸子百家之書都已非難得之物。但我們不能對蘇軾的話推行過度,如北宋張安道須向人借三史,顯示這類書籍在當時仍是奢侈品。魏了翁(1178-1237)記載友人之父丁泰亨(1123-1196)的例子—「公幼而明晤,日記二千言,時版本文字尚少,經、傳、《史》、《漢書》皆畫抄夜誦。」見〔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卷81,〈贈奉直大夫丁公墓誌銘〉。顯示當時書籍流通的程度仍有限,抄寫傳錄仍有必要。

⁴⁷ [清]楊名中,〈潘方陵一枝集序〉,收入[清]盧文弨輯,[清]莊翊昆等校補,《常郡八邑藝文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6 下,〈國朝序〉,頁 618。

歐陽修的讀書法雖在宋代提出,但在入明以後更加流行,受到明人的重視。

正是在書籍流通較多與科舉考試制度化的背景下,署名為歐陽修與鄭耕老(1108-1172)各有一套讀書法,這兩套讀書法是否確實是歐陽修與鄭耕老所作,今已難以考證,在後世的流傳上——尤其是署名歐陽修的讀書法的廣泛流行,加上歐陽修在宋學的位置,以及文章泰斗的身份,⁴⁸讓後世士人更願意認定是歐陽修所作,於是虛亦作實了。這兩套讀書法的共通點是要求士人必須記誦全部的儒家經典,所以不僅計算儒經的總字數,而且根據總字數換算出平均每日須記誦的字數,最後更宣稱這是讓中人或中人以下之士所遵循的標準,亦即這是最低要求,是絕大多數士人都能夠做到程度。歐陽修的讀書法如下:

立身以力學為先,學以讀書為本。今取《孝經》、《論》、《孟》、 六經,以字計之:《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萬有一千七百五 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 《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 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 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止以中才為准,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 畢。或稍鈍,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其餘觸類而長之,雖縷秩浩 繁,第能加日積之功,何所不至!

歐陽修只列出八部經書。若據錢泰吉 (1791-1863) 所錄鄭耕老的讀書法,則 是更擴充到十三經,十三經的總字數共六十四萬字,錢泰吉說:

十三經共六十四萬七千五百六十字。荒經者每日能温熟一千字,兩年 可畢;即有他務閒斷,亦兩年半可畢;乃因循歲月,一經未治,殊爲 可惜。姜西溟謂,東方朔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 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成數算之,則一日所誦,纔得二百零三言

_

⁴⁸ 關於歐陽修在宋學的地位,請見錢穆,〈初期宋學〉,收入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 論叢》,第3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頁1-17。

^{49 [}元]佚名,《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甲集, 〈歐陽文忠公讀書法〉,頁 16。

耳;葢中人最下之課也。50

以上都是針對儒經而設。由於一日所記只有數百字,所以被認定是「中人最下之課」。王梓材 (1792-1851) 認為鄭耕老之說是本自歐陽修。 51

歐陽修讀書法流傳很廣,而且被收入元人所編《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 〈歐陽文忠公讀書法〉條中,儼然成為士人所應追求的典範。而且這個讀書 法所未明言,但又極為明顯的意思是:若有人無法做到,就是自甘於閒逸偷 惰,所以長輩教導子侄時,也會引用此讀書法,如清初姜宸英(1628-1699) 與子姪論讀書時說:

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且可不致遺忘。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今計九年可畢,則日讀百五十字。52

綜言之,此讀書法對記誦能力立下很清楚的標準,每日幾字、應記誦哪幾本經典,都有很具體的規定,而且宣稱這只是中人之法,亦即對四民之首的士人而言,這應是大多數皆可行的。過去士人若見人有日誦萬言或過目不忘的能力,或會將之視為超凡才能與傳說,詠歎讚美而視為不可及。但如今歐陽修讀書法所規定的日誦三百字的進度,卻讓士人無可推諉,避無可避,而不得不面對與承擔記誦全部儒經的壓力。

^{50 [}清]錢泰吉,《曝書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1,頁2-3。計算十三經字數內容如下:「《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周禮》四萬九千一百五十六字,《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二千一百十三字,《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⁵¹ 見〔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 (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4,〈廬陵學案·機宜鄭先生耕老〉,頁 220,王梓 材(1792-1851)案語:「……是先生之說蓋本歐公,而字數有異爾。」

⁵² [清] 盧文弨,〈與從子掌絲書〉附記,收入[清]賀長齡、[清]魏源等編, 《清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5,〈學術五·文學〉,頁137。

五、對記憶力的焦慮困擾

這股風氣讓不少人十分焦慮,畢竟每個人的記憶力有別,儘管一日三百字,看似是中人亦可達成,但所規定記誦儒經的字數,加總以後達數十萬之多,若想維持不忘,洵實不易。偏偏該讀書法規定應記誦的儒經跟科舉考試密切相關,並非是為了炫耀博學而設,所以又讓士人很難推諉不理,於是士人不僅必須「六經不可一日去手」,而且還有「夾袋六經」(類似巾箱本)的發明,以便士人在行住坐臥間皆可背誦。53

尤有甚者,當許多士人被記誦全部儒經的要求所困擾時,偏偏還有一些精英士人對此標準不以為足,刻意在書單上增列新的書籍。例如以博學著稱的胡震亨(1569-1645),便增加子部、《史》、《漢》與《文選》等書進入書單中,而把標準懸得更高,他說:

人日誦萬言,以書葉計之,不過二十許葉,似不為多,然必加遍數方熟;如加十遍,便是二百葉書,那得不費一日。此惟上等天資能辦, 未可輕言也。⁵⁴

又說:

今且誦他十分之一,千言加之百遍,書亦可漸讀盡。偶閱《癸辛雜識》,記有《易》、《書》、《詩》、《禮記》、《周禮》、《春秋左傳》,字數共五十三萬有奇,……是誦萬言者五十日之功,誦千言者五百日之功也。更加以諸子、《史》、《漢》、《文選》等書,亦不過加二三千日足辦。人只因循過日不讀,或讀亦作輟自廢耳,若肯拚數年工夫讀去,何患書之不盡,作一淹博名流哉!吾老矣,度不能垂頭償此願,書此,望兒孫輩亟圖之。55

-

^{53 [}宋]葉夢得,〈論藏書〉三則,收入[明]董斯張等輯,《吳興藝文補》,卷 16,頁 53:「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前輩說劉原父初爲窮經之學,寢食坐 卧,雖謁客,未甞不以六經自隨,蠅頭細書爲一編,置夾袋中;人或效之。後傭書 者遂爲雕板,世傳夾袋六經是也。」

^{54 [}明]胡震亨,《讀書雜錄》(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卷上,頁711。

^{55 「}明〕胡震亨,《讀書雜錄》,卷上,頁 711。

胡震亨先承認能夠日誦萬言的人極少,所以「降低」標準,只要求日誦千言,但所記誦的書籍,除了儒經以外,還包括諸子、《史記》、《漢書》、《文選》等書,總字數非常多。在胡震亨看來,如此才足以作一淹博名流,但其實這已非常人可行,即連胡震亨本人也自承未能做到。不過,若是從前後語義來看,讓人不免懷疑胡震亨或許只是追求熟讀,而未必要求記誦,就像前引夏允彝之父熟讀《通鑑》到各個細節都能流利說出一樣,而給予旁人已記誦下全部內容的印象。

胡震亨的態度所反映的是在此對記誦能力的追求風氣下,人們已很難達 到滿足點,所以無論是歐陽修的讀書法,或是類似胡震亨的態度,都帶給士 人極大的不安或焦慮,而且這種不安或焦慮,不僅限於沒有功名的士人而 已,即連舉人、進士中亦有人為此而倍感壓力。如明末徐芳,他是進士出 身,但連他也為記憶力所困擾,他指出:

予性闇儘而喜讀書,自經史以逮百家傳記之言,目之所涉,十得六七也,而往往逸去不為我有。當其快適,自謂了無剩義,及掩卷移晷,即已惘然無所記識,豈非務博而不能專之過與!即以為大意既得,其浩瀚纖瑣,無庸過為馳注,然理可以類通,事不可以臆舉,大意之悮,其病有時與不讀書等。56

所讀的是經史百家傳記之言,不限於儒經而已,而且是「目之所涉,十得六七」,記憶力已算甚佳,但他仍無法滿意,甚至以「與不讀書等」來自責。 所以徐芳試圖發展一種記憶術,利用摘要的方式以幫助記憶,但仍可想見他 對記憶力的焦慮與不安。徐芳說:

故嘗以為古人之學,博聞之外,必資強識。而卷籍委積,非有異慧絕世,終不能兼綜無漏。莫若即其辭事之該切宏鉅者,編綴成書,使口可誦而帙易書,于目無繁營,而胸有堅據,庶乎剗蕪塘濫,以歸精約之道也。⁵⁷

_

^{56 [}清]徐芳,《懸榻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2,〈讀史要編序〉, 頁 75。

^{57 [}清]徐芳,《懸榻編》,卷2,〈讀史要編序〉,頁75。

徐芳的記憶術,讓人聯想到一度流行於晚明的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的西洋記憶術。利瑪竇在萬曆年間來到中國居住,與當時士人有很頻繁的往來,而他注意到中國士人對記憶的執著與焦慮,在史景遷的《利瑪竇的記憶宮殿》一書中,便指出利瑪竇利用記憶術吸引士人的目光,如利瑪竇談到石星之子,他在科舉考試落榜後,身心都處在接近崩潰的狀態,利瑪竇便利用他對及第的渴望而傳授其記憶術。⁵⁸利瑪竇對此記憶術很有把握,他很肯定得授此記憶術的學生將有十分驚人的成效,他說:

凡記法既熟,任其順逆探取,皆能熟誦。然後,精練敏易,久存不 忘。⁵⁹

利瑪竇以文言文寫作《西國記法》,讓我們可以得窺其記憶術的大致內容。 利瑪竇在此書指出,必須把須記憶的事物化為實在的物件,放置在想像的處 所中,而且針對中文的文字特點,設計出多種把中文文字轉為圖像的方法。 他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句話為例,記憶方法是:

以俊秀學童立觀書冊為「學」字,以武士倒提钂爬象「而」字。以日照寺前,一人望之,象「時」字,或以姓「時」、名「時」之人。以日生兩翼,一人駭觀,象「習」字,或以姓「習」、名「習」之人。以一人持尺許之木,削斷其頭,象「不」字。以一人烏橫一戈,腰懸兩錘,象「炎」字;「炎」,篆文,即「亦」字也。以傳說築巖,取「說」字,或以一人拍手仰面而笑,亦象「說」字。以一胡人胡服而居,假借「乎」字。以上九字,逐字立象,循其次第,置之九處,此蓋一字寄一處之例也。60

簡言之,就是用形象的方式記憶每一個字,然後每個字在記憶宮殿中各有位置,也就是「一字寄一處」的意思。

除了徐芳及利瑪竇的記憶術以外,醫書也相當程度反映了人們對記誦能力的追求。前述「日誦萬言」只有上才者才能做到,兩宋以來的一些醫書便

 $^{^{58}}$ 這一段所述內容參見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陳恒、梅義征譯,《利瑪竇的記憶宮殿》(臺北:麥田出版社, 2007),頁 185 。

^{59 [}明]利瑪竇,《西國記法》,〈明用篇第二〉(合肥:黃山書社,2005),頁7。

⁶⁰ 「明〕利瑪竇, 《西國記法》, 〈定識篇第五〉, 頁 13-14。

以「日誦萬言」為目標而開處方。如流行甚廣的鐵甕先生瓊玉膏便跟此有關,此藥方最早見於南宋洪遵(1120-1174)的《洪氏集驗方》,用藥是人參、 生地黃、白茯苓:

此膏填精補髓,腸化為筋,萬神具足,五臟盈溢,髓實血滿,髮白變黑,返老還童,行如奔馬。日進數食,或終日不食亦不飢。關通強記,日誦萬言,神識高邁,夜無夢想,......⁶¹

此處主述對修煉成地仙的益處,日誦萬言只是成效之一。至於北宋張君房所編的《雲笈七籤》中的「開心益智方」與「安神強記方」,而服食其方的效果,雖亦與成仙有關,但也有增強記憶的效果,前者的藥方是胤粉、菖蒲、遠志、人參、龜甲、署預、龍骨——

服得百日,心神開悟;二百日,耳目聰明;三百日,問一知十;滿三年,夜視有光,日誦萬言,一覽無忘,長生久視,狀若神明。⁶²後者的藥方是胤丹、防風、遠志、天門冬、菖蒲、人參、茯苓及通草——

服得三百日,舊日之事,皆總記之;六百日,平生習學者,悉記儼然;九百日,誦萬言,終身不忘。⁶³

南宋張杲(1149-1227)的《醫說》引所的〈健忘詩〉,同樣以日誦萬言 為目標:

健忘詩云:桂遠人三四,天菖地亦同,茯苓加一倍,日誦萬言通。⁶⁴ 桂遠人即官桂、遠志、人參;天菖地即巴戟天、石菖蒲、地骨皮。以上不斷 出現的菖蒲應即石菖蒲,與遠志同樣都有安神益智、治健忘的功效。⁶⁵

儘管人們普遍重視記誦能力甚至為此焦慮,但我們也不應忽略流行於宋

^{61 [}宋]洪遵撰,《洪氏集驗方》(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0),卷 1,〈鐵甕先生神仙祕法瓊玉膏〉,頁 5;亦見 [元]忽思慧,《飲膳正要》(上海:上海書店,1984),卷 2,〈鐵甕先生瓊玉膏〉,頁 12b; [元]王好古,《醫壘元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卷 9,〈瓊玉膏鐵甕先生方〉,頁 50b。

^{62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78,〈方藥·七主開心益智〉,頁13b。

 $^{^{63}}$ [宋]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 78,〈方藥·十六主安神強記方〉,頁 19a-b。

⁶⁴〔宋〕張杲,《醫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5,〈健忘詩〉,頁106。

⁵⁰ 李永春主編,《實用中醫辭典》(臺北:知音出版社,2011),頁 195。

元明三代的理學,對知識與記憶力另有一套看法,而且也帶來不小的影響。

六、另一種聲音

前文談到歐陽修讀書法的流行,以及科舉考試的制度化,使得記誦儒經一事倍受重視,但同時代不會只有一種聲音,也不會只有單一標準。當人們一時追求記誦儒經時,宋明兩代的程朱學者與心學家皆指出另一條路、另一種選擇,這個選擇不是反對記誦,不是要求士人不必記誦,而是對記誦儒經有另一種見解與立場。

科舉制度始於隋唐,在實行之初,唐高宗朝的劉嶢已注意到科舉助長人 們對日誦萬言的追求與推崇,以致於背離了儒學的真諦,遂上疏說:

國家以禮部為考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於才藝,不 務於德行。……至如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 人。……今捨其本而循其末,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 近典謨,勞心於草木之閒,極筆於煙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 此處主要是對科舉考試以文藝為主的批評,所以把文藝與德行對立,而「日誦 萬言」與「文成七步」便被放在理體與化人的對立面。理體的確定涵義未明, 有可能指儒經所載的施政原則。在劉嶢看來,即使記憶力強,仍無益於治。

劉嶢的批評在當時尚只是空谷足音,附和或同道者不多,而隨著理學的興起,劉嶢的這段話不僅被重新提起,⁶⁷而且理學家還拋出新見解。理學興起的背景之一,是為了應付日益增加的書籍及知識,所以區別尊德性與道問學,而把尊德性放到第一位。對於人們嚮往的日誦萬言,程頤(1033-1107)表示——

^{66 [}唐]杜佑,《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7,〈選舉五〉,頁186。67 如元代吳澄(1249-1333)便重述劉嶢的發言,說:「蓋儒之為儒,非取其有日誦萬言之博也,非取其文成七步之敏也,以其孝悌於家,敦睦於族,忠信於鄉,所厚者人倫,所行者天理爾。」〔元〕吳澄撰,〔元〕吳當編,《吳文正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卷 30,〈贈建昌醫學吳學錄序〉,頁 19b-20a。劉嶢的奏摺載於杜佑《通典》,我們不確定吳澄是否讀過此書,而吳澄竟特別注意到劉嶢的這段話,可見對此頗有會心與同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其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⁶⁸

程頤並未否定日誦萬言的價值,但是將其視為天賦而不可學。至於對記誦的態度,則可見程顥(1032-1085)批評謝良佐(1050-1103)的這段話,《近思錄集解》記載如下:

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 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 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 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人心虚明,所以具萬理而應萬 事,有所繫滯,則本志未免昏塞,所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 苟徒務記誦爲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

謝良佐應是記誦無礙之士,以此自負,但卻被程顥說成是玩物喪志,所持理由是:讀書是為存心而明理,亦即尊德性,若偏重記誦,則將流於逐末。⁷⁰ 呂本中(1084-1145)的弟子林之奇(1112-1176)亦附和說:

誦記之於學,末也。古之君子,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學,既已先立乎其大者矣,然後以其餘力及之,而非所以先之 也。……洎夫科第興,而士之大學既已悖其先後本末之序矣,則小學 亦流而為博洽捷給之歸,利祿之所在,萬矢之質的也。⁷¹

朱熹也多次回答門人弟子有關記誦的問題,而這些對話多被收錄在《朱 子讀書法》中,該書是朱熹門人輔廣所輯,張洪、齊熙補訂,節錄朱熹文 集、語類中的內容,排比綴輯,分門隸屬,如四庫館臣所說,雖不足以言著

69 [宋] 葉采,《近思錄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2,頁480;亦見於[清]陳沆,《近思錄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2,頁700。

^{68 [}宋]石憝編,[宋]朱熹删定,《中庸輯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卷下,頁601。

^{70 [}宋] 葉采,《近思錄集解》,卷 2,頁 480;亦見於[清] 陳流,《近思錄補注》,卷2,頁700。

⁷¹ [宋]林之奇,《拙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卷16,〈送陳童子序〉,頁17。

述,但「條分縷析,綱目井然,於朱子一家之學亦可云覃思研究矣」。⁷²朱 熹的著作甚多,一般人往往難以通讀盡覽,而該書因僅有四卷,反而有利於 流通,所以讀者不少,直到當代仍為不少人所知。⁷³在此書中,朱熹否定秦 漢以來重視記誦的讀書法,他說:

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 修身之要。⁷⁴

兩宋理學本有質疑秦漢以來學術的傾向,朱熹甚至把秦漢以來的讀書法片面 界定為是以記誦剽掠為功,對此我們固然不必同意此一刀切、把秦漢與兩宋 理學的讀書法界定為記誦與窮理的作法,但朱熹把兩種讀書法截然劃開,去 彼取此的立場則是確定的。

不過,朱熹並未否定記誦的必要,他認為記誦是為了理解義理,所以引 張載 (1020-1077) 的話說:

横渠 (按: 張載) 云:書須成誦,精神都是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

又說:

書只是熟讀,常常記在心頭始得。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77

主張「書須成誦」,理由是:必須成誦,才能夠時時反思回想。所以不僅不 強調記誦能力,而且朱熹更建議應「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意即日日皆須 用功,但可少讀慢讀,即使一日僅讀一兩百字亦無妨,他說:

⁷²〔清〕紀昀等,〈提要〉,收入〔宋〕張洪、〔宋〕齊熙同編,《朱子讀書法》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首,頁351。

⁷³如錢穆、余英時等先生便常稱引,如余英時說:「中國傳統的讀書法,講得最親切有味的,無過於朱熹, ······朱子不但現身說法, 而且也總結了荀子以來的讀書經驗, 最能為我們指點門徑。」見余英時, 〈怎樣讀中國書〉, 《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臺北:三民書局, 1992), 頁 262。錢穆, 〈朱子讀書法〉, 收入氏著, 《學籥》(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4), 頁 5-33。

 $^{^{74}}$ [宋] 張洪、齊熙同編,《朱子讀書法》,卷1,〈綱領〉,頁356。

 $^{^{75}}$ [宋]張洪、齊熙同編,《朱子讀書法》,卷1,〈熟讀精思〉,頁 367。

⁷⁶ [宋]張洪、齊熙同編,《朱子讀書法》,卷1,〈熟讀精思〉,頁 368。

^{77 [}宋]張洪、齊熙同編,《朱子讀書法》,卷1,〈熟讀精思〉,頁 368。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而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為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寬 著期限,緊著課程。⁷⁸

以及必須多誦遍數,他說:

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79

讀書法且先讀數十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二三分,又 卻讀正文,又得一二分。⁸⁰

這兩點正與一目十行、過目成誦的要求相反,所以當有人為資質魯鈍,記憶力不佳而苦惱,朱熹便開導說:

時舉云:某緣資質魯鈍,全記不起。先生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 福州陳晉之極魯鈍,讀書只五十字,必三百遍而後能熟,積累讀去, 後來卻應賢良。要之,人只是不會耐苦耳。⁸¹

這段對話很有趣,因為類似的對話大概很難發生在前文所舉的那些記憶力極 佳的人身邊,他們自身既不會有此憂慮,而且在炫耀與標榜記憶力的風氣, 「資質魯鈍」的人很容易被排擠到邊緣,而難有發言權。但這些人卻願意跟 朱熹訴苦,而朱熹也寬慰之,鼓勵他們不必好高鶩遠,只須從五十字做起, 即使讀誦三百遍之多才能記下亦不妨。

朱熹「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的原則,以及強調遍數、一點點積累到極熟的作法,影響所及而有程端禮的《讀書分年日程》。據其讀書法,依序有讀經日程、看史日程、看文日程、作文日程。經書須記誦,史籍須熟讀,看文、作文則直接跟科舉寫作有關。⁸²此書規定:

日止讀一書,自幼至長皆然。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語。隨日力、性資, 自一二百字,漸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千字乃已。每大段

⁷⁸ [宋]張洪、齊熙同編,《朱子讀書法》,卷3,〈熟讀精思〉,頁 401。

⁷⁹〔宋〕張洪、齊熙同編,《朱子讀書法》,卷 1 ,〈綱領〉,頁 360。

⁸⁰ [宋]張洪、齊熙同編,《朱子讀書法》,卷3,〈熟讀精思〉,頁 399。

^{81 [}宋]張洪、齊熙同編,《朱子讀書法》,卷1,〈熟讀精思〉,頁 367。

⁸² 參見〔元〕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合肥:黃山書社,1992),卷 1、2,尤其是頁77-80。

內,必分作細段。每細段必看讀百遍,倍讀百遍,又通倍讀二三十 遍。後,凡讀經書仿此。⁸³

至於讀書的工夫,則是秉承朱熹說書須極熟的主張,所以每天除了新功課以外,還必須把前幾天所讀的再複習過,具體方式即分段看讀百遍,背誦百遍,然後再通篇背讀二三十遍。⁸⁴如其所言——

既每細段看讀百遍,倍讀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溫冊首書,夜以序通倍溫已讀書。守此,決無不熟之理。⁸⁵

也因此,從八歲入學始,須花六到七年的時間,才能夠把包括《小學》、《四書》及幾部經書的正文讀熟。但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也說「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所以我們不應忽略此處規定每日所須記誦的字數,是以一二百字為基礎,而以能夠達到近千字為佳,等於是「日誦千言」。這也顯示朱熹的讀書法雖儘量不凸出科考的壓力,但到了《讀書分年日程》卻已不能不正視此問題,而無法僅滿足於每日只讀一二百字而已。也可以說,朱熹的讀書法落實到實踐時,也不得不在科考壓力下有所妥協與讓步。《讀書分年日程》的影響十分深遠,直到明末仍有實踐者。⁸⁶

也因此,儘管程朱學者批評一目十行、日誦萬言之風,但連程朱學者本身也不易完全擺脫這股風氣的糾纏。首先,《讀書分年日程》中要求記誦經書,而儒經的總字數達數十萬字之多,這點就須具備相當程度的記憶力。其次,兩宋儒者並不排斥博學,而且有「一事不知,儒者所恥」之語,而博學與記誦往往會被聯繫在一起,程朱學者所標舉的「格物窮理」既是窮究事事物物之理,所以也有博學的傾向。⁸⁷尤其在程朱學成為官方認可的學術,

數百過,故其書終身不忘」。〔明〕高攀龍,《高子遺書》(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1),卷9下,〈諸延之先生七十序〉,頁266。

^{83 [}元]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1,〈自八歲入學之後〉,頁 28。

⁸⁴以上俱見〔元〕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 1,〈自八歲入學之後〉,頁31。

^{85 [}元]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1,〈自八歲入學之後〉,頁40。 86 如高攀龍(1562-1626)之友諸延之,據說他「於書無所不誦,雖至精熟,必覆讀

⁸⁷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收入氏著,《歷史與思想》(臺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頁87-119。

《四書集注》成為科舉考試的定本以後,士人為了應試,即令研習程朱學的 典籍亦不免流於記誦訓詁。張洪在《朱子讀書法》的序言中批評「以記覽為 工者」是「誇多鬬靡,務以榮華其言,希世取寵而已,法於何有」,⁸⁸儘管 未必專指士人為舉業讀書而言,但末流確實落入此弊,明代知名的布衣學者 陳真晟(1410-1473)便批評說:

學校雖用程朱之書,然不過使之勤記誦訓詁攻舉業而已,而於身心正學之教,則實未嘗舉行故也。⁸⁹

明中期陽明心學興起,在心性學說及對儒經的解釋雖與程朱學立異,但 批評記誦的態度則是一致的,而且走得更遠。在「拔本塞源論」中,王守仁 攻擊當時的程朱學末流流於記誦詞章訓詁的弊病,然後完全立腳在道德性命 之學的這一邊。⁹⁰王守仁跟大弟子歐陽德(1496-1554)的對話,也表達王守仁 把良知超然於道問學之上的立場。歐陽德問:

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 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 合一之功矣。⁹¹

王守仁則是直截斬斷多聞多見涉入良知的可能性,而回答說:

若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 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⁹²

若是跟程朱學必須窮盡萬事萬物之理,等待「一旦豁然貫通」相比,王守仁 主張必須提挈良知,而且良知獨立於見聞之上。朱、王的學術之辨有極精細 而複雜的部份,程朱學並未把心性與見聞混淆為一,但我們若是把陽明心學

^{88 [}宋]張洪,〈編定《朱子讀書法》原序〉,收入《朱子讀書法》,卷首,頁352-353。

^{89 [}明]陳真晟,《布衣陳先生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1, 〈程朱正學纂要〉,頁 350。

^{90「}拔本塞源論」見〔明〕王守仁著,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冊 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卷2,〈語錄二·答顧東橋書〉,頁45-62。

^{91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新編本)》,册 1,卷 2,〈語錄二·答歐陽崇 一〉,頁 77。

^{92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新編本)》,冊 1,卷 2,〈語錄二·答歐陽崇一〉,頁 78。

與同時代的程朱學末流相較,陽明心學確實更側重在心性良知的這一面。對 於士人所關心的舉業文字,王守仁也用良知來說:

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 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 之;有誇多鬥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

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不能有強記之心,不能有欲速之心,不能有誇多鬥靡之心,凡此幾種心,皆與一目十行、日誦萬言的趨向相近相通,而必須用良知克去。

〈訓蒙大意〉則可視為王守仁的讀書法,他說: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虚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94

大旨是讀書貴精熟,以及對能讀二百字者只授予一百字,而且必須紬繹反覆字句,直到領悟其字義為止。這雖是教導生童之法,仍可反映王守仁的主張。跟前引朱熹談讀書法相較,兩人都求精熟而不求多讀,也都強調專心一志、反覆誦讀。我們甚至可以說,儘管朱、王二人對心性義理的見解有別,但王守仁卻以良知學引導人們重新回到朱熹的讀書法的原則及精神。

稍後的一些士人,如李長祥(1609-1673)與董其昌(1555-1636),二人也跟朱熹、王守仁有類似的見解。他們未必受到程朱學或陽明心學的直接影響,但或可視為是在理學空氣下而得出相似的見解。董其昌,字玄宰,南直隸華亭縣人,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他是著名的書畫家,也是制藝名家,同時與理學陣營的人頗有聯繫,所以天啟年間首善書院講學便有董其昌的身影。⁹⁵董其昌著有《舉業蓓蕾》,以教導後輩如何讀書及作舉業文,在

_

^{93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新編本)》,冊 1,卷 3,〈語錄三·傳習錄下〉,頁110。

^{94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新編本)》,冊 1,卷 2,〈語錄二·訓蒙大意示 教讀劉伯頌等〉,頁 97。

⁹⁵天啟初年鄒元標(1551-1624)、馮從吾(1556-1627)在北京倡立首善書院,當時

其中一段標題是「記誦是些小過度」中,他說:

記誦是些小過度。莫亂記。人若靠得自家性靈,便不須靠別人,此可 與覺者道。今人頭場,記那腐爛時文,去改竄成篇;二三場,記那程 墨舊話,去套寫,亦曾舉網得魚,終是別人羅網,已陳芻狗,何所用 之?且見近時場中,最厭棄此品,恐不是實靠得的。莫若只靠自家性 靈,靠看書功夫作主也。難道不記?茅莫亂記那腐爛時文,莫亂記那 怪誕書。……莫多記。不記些,怕枯索了;多記,又怕塞我真靈。今 人苦無記性,又苦記不得許多,終日悶悶,靈機自牿。今且無多記, 理學編集若干,時時涵泳;史、子編集若干,間嘗摹擬;程文揀錄數 十篇,墨卷揀錄百餘篇,二三場亦只揀擇上上程墨,共記數十篇,時 嘗溫習,時嘗玩想,久之自有解處。

董其昌重複標記性靈,應跟晚明文壇講究性靈以及董氏本人篤信佛學有關,而無論是性靈詩派或三教合一之風下的釋氏之學,都跟陽明心學頗有淵源,而且董其昌所說的性靈與舉業文的關係,也跟王守仁對良知與舉業文的關係的談法很相近。

李長祥,字研齋,四川達縣人,崇禎十六年(1633)進士,是清初唐甄(1630-1704)的舅父,唐甄的思想接近陸王心學一路,李長祥說:

世之侈言讀書者,謂一目數行下,甚謂一目數十行下,此不知讀書者之言也。卽有其人矣,亦不知讀書者之所爲也。又謂過目成誦,此亦不知讀書者也。……今書之垂於古人也,無論聖人之書,卽諸子百家之書,彼其作之固有指矣,而常以終身。夫終身作之,一旦而窮之,古無是也。……余不敢謂能讀書,而亦不敢不勉。常取數年前所讀之書,再讀之,其前之以爲是者,今則惑焉;其以爲布帛之文,雖野人之猶被服者,今則美錦而欲著之矣。蓋精義沈藏於文字,聚我心思,

96 [明]董其昌編,馬鏞點校,《董其昌全集》,冊 3(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2013),〈舉業蓓蕾〉,頁 43-44。

首輔葉向高(1559-1627)為此撰文,而由董其昌書寫。〔明〕葉向高,〈新建首善書院記〉,收入〔明〕馮從吾,《馮少墟續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7),〈附錄〉,頁776。

久乃得之。故曰:「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非謂人之處於敏,而已實遜焉,故爲是勤苦之,以自補其不逮也。讀書之方如是也。雖以孔子言之,猶然也。若數行下,數十行下,與所謂過目成誦,皆絕異於人者也,吾不慕之矣。⁹⁷

無論是追求一目十行或過目成誦者,都被李長祥批評是「不知讀書」。在李長祥看來,既然精義沈藏於文字中,所以理想的讀書方式,應是聚精會神,久乃得之。這跟前引王守仁說——「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⁹⁸,可謂是如出一轍。

儘管程朱學或陽明心學在追求一目十行、過目成誦的風氣之外開了另一條路,此路卻甚顛簸難行且備受挑戰。無論是程朱學者或心學家都沒有讓人不管記誦的意思,他們所在意的,是人們不應被追逐記誦的風氣所影響及纏擾,以致於輕忽了對儒經義理的深究。但也因此在日常實踐上,人們仍有可能淹沒沈溺到龐雜的典籍中。尤其是明中期以後,許許多多過去未見或難得的古籍紛紛問世,這類書籍的大量增加與廣泛流行,讓學風日益轉向博學多聞這一邊,理學陣營對此不僅難以應對,甚至一些心學家也走入博學一途,如泰州學派的焦竑(1541-1620)就以博學著稱。何良俊(1506-1573)對陽明心學的批評,正可說明理學陣營——尤其是明中晚期流行的陽明心學所面臨的挑戰之嚴峻。何良俊以博學著稱,家中藏書達四萬卷之多,而他曾與聶豹(1487-1563)有過一段對話,他記述道:

壬子 (1552) 冬到都,首謁雙江先生。先生問:別來二十年做得甚麼功夫?余對以二十年惟閉門讀書,雖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獵兩遍。先生云:汝吳下士人,凡有資質者,皆把精神費在這箇上。蓋先生方談心性而黜記誦之學故也。余口雖不言,心甚不然之。⁹⁹

_

^{97 [}明]李長祥,《天問閣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3,〈讀書作文〉,頁 247。

^{98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新編本)》,册 1,卷 2,〈語錄二·訓蒙大意示 教讀劉伯頌等〉,頁 97。

^{99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國書店,2000),卷5,頁43。

廿一史指明以前不含《舊唐書》及《舊五代史》的歷朝正史,共 2531 卷,而明人喜用讀竟廿一史以宣示其博學。倘若何良俊確如所言花費 20 年的時間把廿一史讀過兩遍,亦即 10 年讀完一遍,可知他是以每日精讀不到一卷的速度在進行,不僅跟一目十行過目成誦追求速度與效率尚有數間之隔,而且所顯示的勤奮與毅力極為難得。不想卻遭聶豹一句話否定其努力,而且隱然有責備他徒耗心力的意思,令何良俊深不以為然,所以他接著說:

蓋經術所以經世務,而諸史以載歷代行事之跡。故六經如醫家《素難》,而諸史則其藥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於今,越歷旣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變,取古人成跡斟酌損益,庶有依據。苟師心自用,縱養得虛靜,何能事事曲當哉!

何良俊不僅批評聶豹不懂史亦不通經,而且懷疑聶豹是因心學瞧不起記誦之 學,隱然把心學與記誦對立起來,指責聶豹「師心自用」。

等到明末制藝風潮起,講究「通經學古」,領導風氣的江南復社與江西豫章派皆強調必須熟讀經、史、子書,等於又回到講究博學與記誦的學風,如名列江右四大家之一的陳際泰 (1567-1641) 便以善記憶為人所稱道,其子記述道:

府君精於史學,一眸而收之,更無遺義。於時邑有士大夫,善記憶,自謂廿一史寢食中物,無敢過而致難者,聞府君能,欲觀其淺深,橫挑數十發,其人交舉交絀,乃再拜謝曰:如君真名士,吾儕猶坐雲霧耳。¹⁰¹ 這又是一場記憶競賽,以廿一史作為記憶力的檢證方式,勝者便可稱名士。既然如此講究記憶力,同樣名列江右四大家之一艾南英(1583-1646)有激烈批評陽明心學的言論便不足怪了,艾南英說:

王氏之學無他,其人束書不觀,遊談無根,必樂易簡,凌躐階級而言 超悟,其高者不過悍然不顧,而以不學為安,以不求於心為得。¹⁰²

^{100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5,頁43。

[[]明]陳孝逸,《癡山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1,〈府君行述〉, 頁630-631。

^{102 [}明]艾南英,《天傭子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卷 4,〈張伯羹稿序〉,頁45。

艾南英是董其昌下一輩的人物,董其昌尚強調性靈,而與陽明心學有互通處,但艾南英則是完全否定陽明心學。艾南英的文章及言論在當世都頗具影響力,而他以「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攻擊陽明心學,應可代表明末不少士人的普遍想法。

七、個案:以金溪地方士人為例

本節將以江西撫州府金溪縣為例,來看一目十行、過目成誦兩詞在地方上的流行與影響,選擇金溪的原因,在於此地能夠蒐集到大量族譜。一般來說,地方史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很常利用當地士人文集與地方志,勾勒地方的士人群體與思想文化系譜,以及更進一步談思想或學術的草根化。但關於「一目十行」、「過目成誦」這類詞語及概念在地方上是否流行,以及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文集與地方志的用處有其限制,畢竟這類詞語或概念本就不會頻繁出現,所以我們即使蒐羅整個縣或府的文集及地方志資料,也許只會得到零星的幾個個案。但若是把範圍擴大到省,如整個江西省,大概就失去了地方史的意義。族譜是很地方性的文獻,而在金溪的各族族譜中,我們看到這兩個詞語多次出現,儘管跟這兩個詞有關的,都是地方上籍籍無名的讀書人,但卻可讓我們看到這兩個詞如何進入到一般人的生活與家庭中。

金溪也有一目十行、過目成誦詞語的流行,而且一如所料,這類詞語在 地方上往往會直接跟科舉考試連結一起,所以有不少例子都是用來形容孩童 的聰慧。例如櫟林周敬修,該族族譜引用其兄的話說:

吾弟敬修,幼聰慧,讀書輒數行下,已咸以亢宗目之。¹⁰³

超溪谷氏的澄再公,被稱作金溪城南之鴻儒,海豐張映台 (1723-1786) 為其作傳,說:

生而類異,讀書數行俱下,為文墨守理法,援筆而成,……乃厄於數 奇,屢試不售,竟以儒士終老。¹⁰⁴

^{103 〔}清〕周穆菴修,《戌元櫟林周氏族譜》,卷1,〈世系横圖·柏六九公〉,頁100。
104
104
105
106
106
107
107
108
108
109
109
10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蘭陵蕭氏的鴻十七公,臨川周光霆為其作傳說:

鴻十七公, ……讀書一目數行, 淹貫經史, 己酉羅郡公徵入文苑。¹⁰⁵ 基本上都是以以一目數行或數行俱下形容其資質穎異, 並直接聯繫到科舉考 試, 所以周敬修因可讀書數行下, 而被寄予復興家族的重責大任。

對過目成誦的使用也跟科舉考試有關,但較多樣化,而且有程度之別, 一種是有著跟記路旁碑一樣的記憶力,如櫟林周氏的周公佐能夠在閱卷後默 寫出所批閱的十餘篇文章——

辛卯,吳邑侯縣試,鳴高(按:周公佐)代閱卷,所拔多知名士。鳴高歸語太翁曰:場中之文磊砢英多,援筆錄十餘卷,不遺一字。其過目不忘如此。¹⁰⁶

至於更進一步,則是如櫟林周氏的周居仁,能夠讀書兩遍後便過目不忘——

公幼聰明,讀書再遍即脫口,……陳惟易見而愛之,因命明年就受業,三載而學成。時陳負重名,從遊者多名宿,每課文必擇其尤者付梓,公文與者十數,而試不售。¹⁰⁷

另外也有標出記誦多少字,千言是較常見的,而萬言較難較少。據此亦 可理解醫書會以「日誦萬言」為標準來用藥的原因。相關記載如下:

(周公佐)天資穎異,日記數千言,儕輩咸望而畏之,餼於郡庠,歲 科首拔者五。

(楊元吉)居平酷嗜讀書,日記數千言,寓目不再。舉業文清真爾雅,以理法為宗,尤精古文辭。¹⁰⁹

_

¹⁹⁹⁶年重修本),卷1,〈澄再公傳〉,頁1。

¹⁰⁵ 編者不詳,《蘭陵丁坊蕭氏六修宗譜》(金溪左坊鎮許家大隊蕭家村蕭伙林管 譜,1995年東邑宗美仁齋寶刊印本),不分卷,〈家傳〉,頁10。

¹⁰⁶ 張殿,〈周元柱先生傳〉,收入周穆菴修,《戌元櫟林周氏族譜》,卷2,頁 169-171,引文見頁 170。

¹⁰⁷周穆菴修,《戌元櫟林周氏族譜》,卷1,〈世系横圖·濟六十公〉,頁 77。

¹⁰⁸ 張麟,〈周元柱先生傳〉,收入周穆菴修,《戍元櫟林周氏族譜》,卷2,頁169-171,引文見頁170。

¹⁰⁹ 徐宗皋,〈楊警室先生傳〉,收入編者不詳,《泗源楊氏家譜》(殘譜)(金溪 琉璃鄉蒲塘楊泗楊九瓶家藏,年份不詳),卷2,頁32-37,引文見頁35。

(周擇) 自髫齔,警挺不類群兒,日課數千言,過目不忘。及長,博 學強記。

(楊廷貴)讀書志古,日誦萬餘言,遇目輒不忘。……胸抱經濟,無以自效,……遂究心於《靈樞》、《素問》。¹¹¹

楊廷貴雖棄儒從醫,但最初仍用心於舉業,所以此處與其他幾人並列,幾人 都是在跟科考有關的場合而被形容為過目成誦。

也有一些跟科考無關的例子,如不求仕進的周甯,以及布衣白丁的王捷 魁——

(周甯)自幼聰敏,質性過人,讀書過目成誦,然不求仕進。112

(王捷魁)為白丁,……資敏善記,喜閱古今傳書,過目不忘,多識 先哲格及及名人流傳詩詞,解韻語,自然合律。¹¹³

尤其是棄儒從商的徐觀成則被形容為「性頗好忘」則頗特別,據載——

(徐觀成)平生業儒,以試數不利,……乃為商,未嘗離卷。少年善為八股藝,……遇書無不讀,尤善觀八股清算法,旁學青囊家言,嘗手抄書,夜深不寐。性頗好忘,遇事輒記而起行之。¹¹⁴

由於不能過目成誦,而必須遇事輒記,所以便被評為「好忘」。

讀書能悟而能記,試多售。115

110 梁大任,〈宣義郎擇公墓誌銘〉,收入周敬群、周盈科等修,《水門周氏宗譜》 (金溪琅琚鎮陳河村周志安家藏,1948年重修本),卷5,頁10-12,引文見頁10。

詹崇,〈杏軒記〉,收入〔清〕楊錫齡等修,《楊氏宗譜》(金溪印山楊軍輝家藏,清光緒九年[1883]重修本),卷1,頁5-6,引文見頁5。

^{112 [}清] 周向日修,《嶐橋周氏族譜》(金溪合市鎮斛塘上周坊村周德生、周細武家藏,清光緒七年[1881]重修本),卷2,〈誠公派下世系〉,頁2。

¹¹³編者不詳,《石峰王氏宗譜》(金溪秀谷鎮王家巷王保光家藏,年份不詳),卷 2,〈毅庵公行略〉,頁7。

¹¹⁴ 徐似錦,〈梧九二公志銘〉,收入徐永山等修,《耿陽徐氏族譜》(金溪琉璃鄉 蒲塘小耿徐氏家藏,2010年重修東鄉何鴻文刊印本),後卷,頁5。

¹¹⁵ 周穆蕃修,《戌元櫟林周氏族譜》,卷1,〈世系橫圖·栢八一公〉,頁 103。

同樣是穆菴公,他在評價族子周禮,則說他「讀書以記誦為主」,¹¹⁶兩者適成對比。周學修的「能悟」,與另一位族人周恒濟很相似,譜上記載周恒濟是「少記誦而研理精」——

(周恒濟)業儒,……讀書少記誦而研理精,晚好岐黃術。¹¹⁷ 這種跟過目成誦相對,而強調「能悟」與「研理精」,是否受到理學的影響所致呢?這點不易回答。類似的敘述可見於萬曆年間范允臨(1558-1641)的文集中。范允臨,南直隸吳縣人,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工書畫,與董其昌聲名相當。他在形容其妻徐君時,便說她「不能記憶」、「多所悟入」,范允臨說:

細君閒居寥寂無所事事,漫取唐人韻讀之,時一做效咿唔短章,遂能成詠,……從此汎濫詩書,上探漢魏六朝,下及唐之初盛,已而直遡 三百篇根源,遂逮楚之騷賦,幡然作曰:詩在是乎!然又不能竟讀, 不數行,頭為岑岑,執卷就臥,思之移時,似有所醒。於書不能記憶,亦不求甚解,而多所悟入,如禪宗之不以漸以頓也。¹¹⁸

范允臨將「多所悟人」連結到禪宗,這跟前引董其昌強調性靈的說法同出一 轍。連結到禪宗的說法,則應跟晚明的三教合一之風有關。

強調研理或領悟的說法,固然不會因理學或禪宗而有,但在過目成誦高 揚的風氣下,若沒有理學或禪宗給予領悟的高度評價,則不容易被作為正面 價值而提出。即使如此,仍只有櫟林周氏的兩則記載而已,也可以說,即使 從兩宋以來,程朱學或陽明心學指出另一條路、另一種選擇,但在科舉考試 的實際需求下,地方上士人仍然一面倒的傾向於一目十行、過目成誦。

另一方面,與悟入相對的背誦,對地方家族而言,這是跟科舉考試直 接相關的,所以更加重要。這也許可以部分解釋,為何到了萬曆中期以 後,隨著陽明心學由盛轉衰,而制藝風潮幾乎有如浪潮一般席捲而來,許 許多多的制藝文社在各地林立而起,而一些理學或心學講會也迅速轉型為

¹¹⁶ 周穆蕃修,《戊元櫟林周氏族譜》,卷1,〈世系橫圖·濟八十公〉,頁 80。

¹¹⁷ 周穆菴修,《戌元櫟林周氏族譜》,卷1,〈世系橫圖·濟六公〉,頁67。

[[] 明] 范允臨,《輸寥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3 ,〈絡緯吟小引〉,頁 265 。

制藝文社。¹¹⁹曾經盛極一時,各地鄉會、家會林立的陽明心學,很快便讓位於制藝風潮,而退居次位。

結語

本文是對博覽強記之風的研究,如何算是博覽強記,這個標準往往是變動而沒有固定答案,所以本文從日常生活中人們常用的一目十行、過目即誦來看這兩個詞在歷代的使用與變化,然後進一步看人們對記憶力的討論。一目十行、過目即誦這類用來炫耀或誇飾記憶力的用詞流行甚廣也甚久,即使到當代仍常有人使用,但有超凡記憶力的人畢竟為數甚少,一個僅適用於極少數人的詞,卻普遍流行於一般士人的日常生活中,那麼人們如何看待及討論記憶力的問題,便很值得注意,所以本文接著把目光焦點放到兩宋以後的歐陽修讀書法,這個讀書法固然不是因科舉考試而有,但其流行有可能跟科考有關。歐陽修讀書法不要求在速度上凸出(如一目十行),也不追求短時間的記誦無誤(如過目即誦),而是把重點放在每日記誦的累積成果上。這一方面讓人們不必執著於天賦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對一般士人給出看似簡單但實則不易達到的標準與要求。

歐陽修讀書法提出中人一日可記誦三百字的最低要求,這點規範了士人的讀書進度,讓士人無法以沒有超凡記憶力為遁詞,這是這個讀書法的關鍵所在。至於讀書法所列的書單,則可以隨時代變遷而更易,於是也讓此讀書法可以因應科考的形式與內容而調整書單。晚明董其昌所列應記誦的書單不是十三經,而是理學編集、子史編集、程文數十篇、墨卷百餘篇,但士人仍可按照歐陽修讀書法的原則,以一日三百字的進度讀書記誦。

兩宋以後的程朱學與陽明心學的讀書法更強調對文字義理的理解,而更 少把重點放在記憶力上。但無論是程朱學或陽明心學仍不可能對士人準備科

前於地方上的理學講會轉型為制藝文社,見張藝曦,〈明及清初地方小讀書人的 社集活動:以江西金溪為例〉,收入張藝曦、王昌偉、許齊雄、何淑宜編,《16-18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臺北:聯經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即將出版)。

考的需求視而不見,所以他們仍不得不有其記誦標準,而其標準較諸歐陽修 讀書法的更低,即使一日僅五十字亦無妨。同時放寬對記誦速度的要求,所 以朱熹說「書宜少看」,而王守仁則說「授書不在徒多」,而更希望人們精 熟所讀書,以求久而能夠義理浹洽。但從金溪的個案來看,理學在這方面的 影響仍很有限。

早期對廣義的理學的研究,較多把眼光放在理學家的學術內容,尤其是少數大思想家的學說,後來陸續注意到這些大思想家以外的其他人,尤其是明中晚期陽明心學流行以後的士人及士人群體,¹²⁰以及更一步談心學家的生活及社會角色。¹²¹但我們仍不能忽略一門學術對一般人生活的影響,這些影響有可能是重要的,只是不明顯可見。這也造成在學術論文寫作上的困難,要廣泛談一門學術對一般人的影響,資料有限,以及不容易證明都是很棘手的問題。這類困難在近現代思想史領域較有可能得到解決,畢竟這段時期的資料極為多元且豐富,包括有許多個人的私密日記,以及流行於人手之間的報紙期刊等。但明清思想史則沒有這些優越的條件。

本文對理學與記誦的討論,就是想看理學與士人生活間的關係。思想對一般人生活上的影響,也許只有薄薄的一層,不易見亦不容易論證,但我們若把這些薄薄的一層,一層層的堆疊起來,累積到一定的厚度,便有可能較容易看到思想的作用。這也表示,我們必須從生活上的許多事物看到思想的痕跡,即使在論證單一事物與思想的關係時或仍不盡如人意,但在對各方各面的事物都研究過後,中間的聯繫便有可能變得清晰起來。但這就需要更多的成果累積了。

120 如清初講經會、陽明學講會,請見王汎森,〈清初的講經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3(1997),頁 503-588; 呂妙芬,〈陽明學講會〉, 《新史學》,9:2(1998),頁 45-87。

¹²¹如王汎森,〈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率學派為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1998),頁 245-294;王汎森,〈明代心學家的社會角色:以顏鈞的「急救心火」為例〉,《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1-28。

本文於 2019年7月30日收稿; 2020年3月22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 柯淑芳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孔融,《孔北海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63,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
-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 〔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 〔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唐]杜佑,《通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03,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宋]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92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
- [宋]史能之纂修,[咸淳]《重修毗陵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 69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 [宋]石憝編,朱熹刪定,《中庸輯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98,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宋]佚名,《新編翰苑新書前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子部冊 74,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抄本影印。
- [宋]李昉等奉敕編,《文苑英華》,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40,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
- [宋]林之奇,《拙齋文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冊26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
- [宋]洪遵撰,《洪氏集驗方》,收入《歷代中醫珍本集成》,冊10,上海:上海 三聯書店,1990,以《叢書集成》本為底,參酌1986年人民衛生出版社鉛印 本校正影刊。
-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收入《道藏要籍選刊》,冊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據民國十二(1923)至十五(1926)年上海涵芬樓縮印明刊

「正統道藏」本選印。

- [宋]張杲,《醫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42,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宋]張洪、齊熙同編,《朱子讀書法》,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09,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宋] 葉采,《近思錄集解》,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冊934,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7,據北京圖書館藏元刻明修本影印。
-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冊216,上海: 上海書店,1989,據上海涵芬樓景印舊鈔本影印。
- 〔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冊1256,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據上海涵芬樓借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刊本景印。
- [宋]蘇軾,《東坡後集》,收入《東坡七集》,冊2,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65,據匋齋校刊本校刊。
- [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收入《四部叢刊·三編》,冊57-58,上海:上海 書店,1985,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刻本重印。
- [元]王好古,《醫壘元戎》,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四集》,冊141,臺北:商 務印書館,197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
- [元]佚名,《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子部冊 61,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刻本影印。
- 〔元〕吳澄撰,〔元〕吳當編,《吳文正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冊322,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
- 〔元〕李冶,《敬齋古今黈》,收入《廣州大典》,叢部冊34,廣州:廣州出版社, 2008,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影印。
- [元]忽思慧,《飲膳正要》,收入《四部叢刊·續編》,冊50,上海:上海書店, 1984,據上海涵芬樓景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藏明刊本重印。
- 〔元〕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合肥:黃山書社,1992。
- 〔明〕文震孟,《姑蘇名賢小紀》,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61,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據萬曆四十二年(1614)刊本影印。
- 〔明〕方以智,《浮山文集後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35,上海:上海

- 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康熙此藏軒刻本影印。
- 〔明〕王守仁著,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新編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社,2010。
- 〔明〕田琯纂修,〔萬曆〕《新昌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冊25, 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4,據寧波天一閣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艾南英,《天慵子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
-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收入《明清筆記史料叢刊》,北京:中國書店,2000。
- 〔明〕何喬遠,《閩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 〔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明〕李長祥,《天問閣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11,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吳興劉氏刻求恕齋叢書本影印。
- 〔明〕沈一貫,《喙鳴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17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刻本影印。
- 〔明〕沈鯉撰,〔清〕劉榛輯,《亦玉堂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8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胡震亨,《讀書雜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冊109,臺南:莊 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八(1679)年刻本影印。
- 〔明〕范允臨,《輸寥館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101,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
- 〔明〕高攀龍,《高子遺書》,收入《無錫文庫》,輯4,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1,據明崇禎五年(1632)錢士升、陳龍正等刻本。
- [明]張大復,《崑山人物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541,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清雍正二年(1724)汪中鵬 重修本影印。
-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1380,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張時徹,《芝園定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82,臺南:莊 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四川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
- 〔明〕陳子龍,《安雅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1388,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末刻本影印。

- 〔明〕陳孝逸,《癡山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49,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
- 〔明〕陳真晟,《布衣陳先生存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1330,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李畿嗣刻本影印。
- [明]馮從吾,《馮少墟續集》,收入《叢書集成·三編》,冊14,臺北:新文豐 出版社,1997,據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藏馮恭定全書本影印。
- 〔明〕黃汝亨,《寓林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1369,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5,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天啟四年(1624)吳敬吳芝等刻本影印。
- 〔明〕楊維新,〔萬曆〕《會稽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冊 28,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明萬曆刊本影印。
- 〔明〕董其昌編,馬鏞點校,《董其昌全集》,冊3,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2013,據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為底 本,以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本為校本。
- [明]董斯張等輯,《吳興藝文補》,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376, 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 (1633)刻本影印。
- 〔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533,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啟刻本影印。
- 〔明〕顧天埈,《顧太史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9,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利瑪竇(Matteo Ricci),《西國記法》,收入《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 東傳福音冊11,合肥:黃山書社,2005。
- 〔明〕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84,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王壽頤、[清]潘紀恩修,[清]王棻、[清]李仲昭纂,[光緒]《僊居志》,收入《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華東卷·下編》,冊94,北京:國家圖書館,2012,據清光緒二十年(1894)活字本影印。
- [清]王壽頤、[清]潘紀恩修,[清]王棻、[清]李仲昭纂,[光緒]《僊居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清光緒二十年(1894)木活字印本。
- [清]汪榮修, [同治]《安吉縣志》, 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

- 冊2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據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影印。
- [清]王昶,《春融堂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358,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0,據清嘉慶十二年(1807)塾南書舍刻本影印。
- [清]何紹章、馮壽鏡修,[清]呂耀斗等纂,[光緒]《丹徒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冊29,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據清光緒五年(1879)刻本影印。
-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733,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5,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降六十年(1795)自然盦刻本影印。
- [清]李來泰,《蓮龕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122,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0,據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影印。
- [清]李銘皖、譚鈞培修,〔清〕馮桂芬纂,〔同治〕《蘇州府志》,收入《中國 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冊9,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據清光緒 八年(1882)江蘇書局刻本影印。
- 〔清〕阮元輯,《兩浙輶軒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1684,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嘉慶仁和朱氏碧溪艸堂錢塘陳氏 種榆千儒館刻本影印。
- 〔清〕金之俊,《金文通公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懷天堂刻本影印。
- [清]徐芳,《懸榻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86,北京:北京出版 社,2000,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
- 〔清〕張其錦編,《凌次仲先生年譜》,收入《乾嘉名儒年譜》,冊10,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 [清]許瑤光等修,吳仰賢等纂,[光緒]《嘉興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號53,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據清光緒五年(1879)刊本影印。
- 〔清〕陳沆,《近思錄補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冊934,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7,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稿本影印。
- 〔清〕陳其元,《庸閒齋筆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冊1142,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7,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影印。
- 〔清〕傅維鱗,《明書》,收入《國學基本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清〕賀長齡、〔清〕魏源等編,《清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
- 〔清〕馮可鏞修,〔清〕楊泰亨纂,〔光緒〕《慈谿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號213,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據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徳潤書院刊本影印。
-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蔣繼洙等修,〔清〕李樹藩等纂,〔同治〕《廣信府志》,收入《中國方志 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號106,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據清同治 十二年(1873)刊本影印。
- [清] 盧文弨輯,[清] 莊翊昆等校補,《常郡八邑藝文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9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六年(1890)刻本影印。
- [清]錢泰吉,《曝書雜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926,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7,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九年(1839)別下齋 叢書本影印。
- [清]錢陳群,《香樹齋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262,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乾隆刻同治光緒間遞修本影印。
- 〔清〕嚴如熤原本,〔清〕楊名颺續纂,〔民國〕《漢南續修郡志》,收入《中國 地方志集成・陝西府縣志輯》,冊50,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據民國13 (1924)年刻本影印。
- [清] 周穆菴修,《戌元櫟林周氏族譜》,金溪合市鎮龔家戌元村周新友家藏,清 道光二十四年(1843)重修本。
- [清]周向日修,《嶐橋周氏族譜》,金溪合市鎮斛塘上周坊村周德生、周細武家藏,清光緒七年(1881)重修本。
- 〔清〕楊錫齡等修,《楊氏宗譜》,金溪印山楊軍輝家藏,清光緒九年(1883)重修本。
- [民國] 孫毓琇修,賈恩紱纂,[民國] 《鹽山新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 北地方・河北省》,號496,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據民國五年(1916) 刊本影印。
- 周敬群、周盈科等修,《水門周氏宗譜》,金溪琅琚鎮陳河村周志安家藏,1948年 重修本。

- 編者不詳,《蘭陵丁坊蕭氏六修宗譜》,金溪左坊鎮許家大隊蕭家村蕭伙林管譜, 1995年東邑宗美仁齋寶刊印本。
- 王加泉修,《超溪谷氏六修宗譜》,金溪琅琚鎮谷家村谷南方家藏,滸灣忠信堂 1996年重修本。
- 徐永山等修,《耿陽徐氏族譜》,金溪琉璃鄉蒲塘小耿徐氏家藏,2010年重修東鄉 何鴻文刊印本。
- 編者不詳,《泗源楊氏家譜》(殘譜),金溪琉璃鄉蒲塘楊泗楊九瓶家藏,年份不詳。 編者不詳,《石峰王氏宗譜》,金溪秀谷鎮王家巷王保光家藏,年份不詳。

二、近人論著

- 王汎森,〈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集刊》,69:2(1998),頁245-294。
- 王汎森, 〈明代心學家的社會角色:以顏鈞的「急救心火」為例〉, 《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1-28。
- 王汎森,〈清初的講經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3 (1997),頁503-588。
- 王雪卿,〈讀書如何成為一種工夫:朱子讀書法的工夫論研究〉,《清華中文學報》,13(2015),頁49-106。
-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陳恒、梅義征譯,《利瑪竇的記憶宮殿》,臺北: 麥田出版社,2007。
- 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1976,頁87-119。
- 余英時,《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臺北:三民書局,1992。
- 呂妙芬, 〈陽明學講會〉, 《新史學》, 9:2(1998), 頁45-87。
- 李永春主編,《實用中醫辭典》,臺北:知音出版社,2011。
- 林素芬,〈論歐陽修的讀書法及其作史之實踐〉,《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 7(2008),頁124-157。
- 林啟屏,〈朱子讀書法與經典詮釋:一個信念分析的進路〉,《中正漢學研究》, 23(2014),頁1-23。

- 胡琦,〈宋元理學家讀書法與「唐宋八大家」的經典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52(2018),頁1-43。
- 張藝曦,〈明及清初地方小讀書人的社集活動:以江西金溪為例〉,收入張藝曦、 王昌偉、許齊雄、何淑宜編,《16-18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臺北:聯 經出版事業公司,將出版。
- 錢穆,〈朱子讀書法〉,《學籥》,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頁5-33。
- 錢穆,〈初期宋學〉,《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冊3,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4,頁1-17。

"Taking in Ten Lines at a Glance, Reciting Ten Thousand Words a Day": The Power of Memory among Literati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ang, I-hsi*

In ordinary life, people who can read quickly and with good memory are often described as "taking in ten lines at a glance," and in written records in antiquity, the phrase "reciting ten thousand words a day," was used, and such people are often regarded as geniuses or as people with unusual talent. However, during periods where such talents were highly regarded in society, these abilities figured prominently and appeared in records with greater frequency. Since scholars discussed these talents at length, it became a cultural phenomenon that is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As literati all pursued the goal of "taking in ten lines at a glance" and "reciting ten thousand words a day," this became a phenomenon of historical interest and significance.

In records from before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ability to "take in ten lines at a glance" and "recite ten thousand words a day" was regarded as a rare and unusual talent. However, from the Song dynasty on, there was a shift, as the reading methods of the famous writer Ouyang Xiu became popular. This reading method put forth an approach for ordinary people and an extraordinary memory was not required. Rather, one could use practical ways in everyday life to accumulate a basis of learning that matched the results of those with extraordinary memory. Once regarded as the brilliant talent of a select few, the ability to recit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words from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Graduate Program of Ethnicity and Culture,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 144 • 張藝曦 明代研究 第三十四期

the Confucian classics now became a high-pressure standard expectation for ordinary scholars. Under these conditions, Neo-Confucian scholars,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School of the Mind, opted for a different path, a different choice. But in the case of Lu Xiangshan's school, the results were very limited.

Keywords: ten lines at a glance, memorization, reading culture, Ouyang Xiu, Neo-Confucianism, School of the Mind, Lu Xiangshan